

和平教育讀書會

導讀篇章：

Shapiro, A. (2002).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peace education. In G. Salomon & B. Nevo (Eds.), *Peace education: The concep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pp.63-72).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導讀人：宋明娟

邁向和平教育的批判教學實踐論

壹、內容概要

全球文化裡的暴力與仇恨

過去的一年，全球各洲又有因仇恨而產生的恐怖行為和痛苦結果，仇恨的來源出於依種族和國家之不同而形成的區分。即使我們談全球化，邁向新紀元，但感覺上仍被充滿仇恨的衝突所衝擊：波斯尼亞、北愛爾蘭、印尼、土耳其、伊拉克、獅子山、盧安達、斐濟、俄羅斯共和國、以色列等地，也只是當中的一小部分。若在相對同質的社會裡，增加區分和仇恨的內在形式（the internal forms of division and hatred），人們也會因其種族、語言、性別、殘疾、宗教、性別認同、移民身份等背景而受傷和被虐。在這個充滿許多仇恨衝突的世界上，談一種能企圖教導更為和平的、較少暴力的、公民的、全球文化的教育，可能意味著什麼？我們對這樣的教學實務知道些什麼？是否這樣的教育，能夠使人們常顯露的惡魔化、非人性化、虐待他人等的天生傾向扭轉過來？在新紀元的開端，很難想像會有比為了修復和治癒我們的世界而奮鬥（猶太人傳統用語謂之 Tikkun Olam）還更為重要的任務。

希望由這些社會的區分（social divisions）所產生的痛苦，在某種角度來說，是人類古老祖先鬱積的餘火。人類雖有侵略、不容忍、非理性地仇視他者等行為，但很少證據顯示人類天性有仇視和殺戮的一面。這些行為似乎並不是來自一個更初民的、更野蠻的世界的殘餘，而顯然是人類處境中更為棘手的層面。在非理性的魔鬼化，以及對他人抱持刻板印象的背後，確有存在不滿和不正義；「在和平之前，必須有正義」的確是有效的宣稱。人類的歷史，有不幸、苦難、剝削、集體屠殺，以及一群人對另一群體施虐等情事，顯示人類所累積的痛苦和仇恨已經不幸地罄竹難書。對正義的需求，如果不是報仇，並不容易令人滿足。正因為如此，製造和平的過程—在受委屈的黨派之間協商—常常是冰冷的，充滿心碎的誤解、困難和挫敗。於是沒有其他能取代無止境的戰爭和敵意的方式。最後，打破暴力、仇恨和不公義的循環，有賴於某種協商和調解的政治。「和事佬（調解者）是有福的（神聖的）」，並非偽善的空言。

然而當今我們應該可以看得比以前更清楚，在人類之間的和平理解和共存，不僅僅有賴於政治領導人之間的協商。我們需要有的是更為根基深厚的轉型過程；即文化態度、信念以及行為方面更為深刻的轉型—的確，特別是在形塑人類如何回應和連結與我們共享世界的他人的心理特質方面應該要如此。對於製造一個對差異即使不尊重也容忍的、並且揚棄暴力的世界而言，政治上的共識和條約是必要的，但不是充份的。我的確相信，我們是有可能利用已經從野蠻行為中學習到的東西，來開始建構一種教育，使孩子可免於暴力、刻板印象，也免於對不容異己者的盲從。為追求真正的和平教育而奮鬥，是新世紀教育的嚴峻挑戰。

新世紀的生活品質，將更有賴於人具有能力去抵制殘酷對待他人的戲碼、建構認同感的誘惑，以及屈辱他人等情事。目前有關教育的談話過於混亂，缺乏遠見和社會想像，而被測驗分數、技術能力，以及要求本國兒童的能力超越他國的想法所束縛。對於另一種教育的訴求，正開始在全世界發聲。經濟和政治的全球化日益滋長，對傳統文化的腐蝕、社群的不穩、富者的極化等，使人類的挫折、憤怒和暴力的可能性增加。我們比從前更需要一種教育，說明為何人類製造戰爭、毀壞生命、侮辱他人、貶低他人的價值，並追隨種族中心主義，或者其他的憤怒和盲從的形式。至少，面對全球化，我們應對教育抱持更為平衡的視野，不只關心處於後工業經濟時代所需的工作能力，也需要有貢獻於多元文化、容忍和尊重差異，以及透過民主的方式來化解衝突的能力和意願。隨著全球的整合和強化，以及衝突的顯現，公共政策需優先關注的項目，應考量以教育降低暴力事件，邁向更和平的世界。我們不知道多少生命有賴於此，但可引領期盼那將會是很多。當然，任何期盼透過教育以減輕世上暴力的企圖，都會面臨非常大的阻力。例如在美國，槍枝的文化（最近統計流通的槍枝超過一千九百萬），以及透過社會而被美化的暴力印象，在形塑青少年男孩的觀感上，影響力不容懷疑。最近跨全球的調查顯示，相當多孩子（差不多兩百萬）被動員為戰士。這些流血的經驗，除了對年輕人造成重傷、殘廢和死亡之外，在心理上的衝擊也很大。任何教育的努力，在這樣的事實之前都變得黯淡無光。

抗拒權威：為民主而教育

Hannah Ardent 提到「邪惡的例行化、常態化 (banality of evil)」概念，在納粹集體屠殺的行為中可找到其事例，而至今我們仍被這樣的力量所牽制：不去質疑對權威的順從，並準備好且願意對他人施加暴行。我們看到年輕人（尤其是男性），被軍隊或一些軍事組織號召，訓練為不經思考地服從指令，去羞辱、恐嚇、殺戮那些被認定為敵人者。我們也聽到那些使人重傷、謀殺他人的人，以自己僅是聽從他人指令作為藉口。不管在納粹德國、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南非或以色列，我們見證到這種教導所帶來的後果：即告知個人其身為好公民或好戰士的意義，就是未經反思地接受他人的決定或指令。然而教導者（和軍隊將領）知道，沒有意識或沒有良心的行動，是一種透過教導而來的反應。在民主的環境中成長和受教，個人可以用批判的態度和反抗指令的準備度來回應權威。那些能承擔自

己的教學是邁向自由的人，知道年輕人在學校和課堂所受的影響，他們的學校和班級會持續培養學生發展批判的想像 (critical imagination)。他們知道具有解放意識的環境，能持續鼓勵孩子質疑假定，挑戰現實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層面，並且把知識和真理視為人所發明出來的產物。能投身於民主教育的教師知道，這樣的環境，能培育自主和激進的特質，去抗拒具有壓迫性的教條，或是喪失人性的要求。

西德有教師瞭解，當教室裡培養出學生獨立思考和質疑的精神，那麼具有批判心智的學生，其想法與法西斯主義和愚蠢的集權主義是對立的。美國 1960 年代起，受到鼓勵去質疑和挑戰文化假定的學生，不會輕易接受種族主義、反猶太人、恐同性戀、性別歧視、或其他憎恨的意識型態。當然，從多年經驗可知，這樣的教學論有時很困難。學生習於的潛在課程是為了成功，人要盲從教師和行政人員的指令；他們常拒絕開始為自己思考，以及質疑他們所聽到的東西。在 Paulo Freire 所謂的儲存式教育 (banking education) 提出多年之後，人們也未必能免於權威教學和隨之而來的被動心態。民主的環境不只意味著要對於挑戰視為理所當然之現實具有準備度，同時也意味著願意去更為負責地決定人要相信什麼和作什麼。被告知去相信什麼和作什麼，常是更為容易的。民主的公民資質並不是自然而來的事，而需要持續和堅持的教育，以養成人適當的道德的、存在的和情感的生存方式。

多元文化教育：傾聽被排除者的聲音

如果更為和平的世界必須是更為正義的，那麼文化改變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改變的文化，能賦予迄今被壓抑者的發聲機會，並予以尊嚴及肯認。

在全球化的人類樣貌中，我們應見到人類經驗的多樣化，對人類表達和創意之複雜性與多樣給予肯認。這意味著有一種教育，能使那些因其語言、宗教、性別、族群、人種、年齡、障礙或國籍背景而被邊緣化或忽視的人，其歷史和經驗變成我們所有人所能意識到和理解的一部份。這樣的教育開始掌握了納入 (inclusion) 的全然意涵，使課程愈能完整反應人類知識和創意的範圍，或者教師在教室裡開始強調人類經驗和歷史的多樣性，就在其經驗和歷史裡頭，而那些來自他人所排除和視而不見的憤怒和怨恨，可以一種希望和可能性來取代。

然而，最終有關納入包容的課程和多元文化學習方面的議題，癥結就在於社會正義的問題。這意味著，關心和平的教育，必須教導學生社會如何創造了階層，給某些人的經驗、文化和人性賦予特權，從而貶低其他人的價值。這樣的教學必須給學生痛苦，並且學生在知道有些人的生命歷經驚險和被剝削，而其文化被拒絕或摧毀之後，常會激起憤怒感。透過這種正義的教學實踐 (pedagogy of justice)，學生開始理解世上的痛苦和暴力，是積累了那些被剝奪機會和尊嚴的人的挫折。舉一個有名的課堂實驗為例，若將一個班級的孩子們分為享有特權的藍色眼睛組，以及受鄙視的棕色眼睛組，這會很強烈地激起後者的憤怒和挫折的感覺。這樣的後果效應可能影響終生。不幸的是，在學校中為正義而做的努力，

常常只是消毒的和溫和的方式進行。例如，在美國課堂上很典型地是透過研讀教科書而為，這只顯示了過去的歷史經驗被沖淡了，很少能留下熱情、承諾和勇氣，而熱情、承諾和勇氣，是要與壓迫的和不公義的體系對抗、或者是一般人要挑戰世間痛苦所必需具備的。我在自己的教學中發現，更複雜的是，學生在學校和世上所享的特權，時常就是經濟、政治、文化不平等的結果。一個人的成功和利益，與這個世界授權給你比別人多的知識、經驗和資源的方式有關連。這意味著，若嚴肅地考量社會正義，一個人必須去對抗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譴責那些地位不利或者受壓迫的人。這些都不是令人舒適或是容易的。學生在檢視自己的生命和處境時，需要有誠實和勇氣。那必需養成一種準備度，在面對以前視而不見的現實情況時，能具有開放的視野和心胸，也必須具有一種意願，能夠檢視自己在排除他者和階層化的體系裡，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我在工作裡的經驗是，這樣的教育，必須在教室裡堅持這個困難的過程：從他人的觀點看世界，並且對於「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答案的重新確認，所引來的痛苦與麻煩具有同感。

衝突，以及惹人不快的認同建構

我們必須承認，認可和讚賞文化認同的教育，以及較少的暴力、更和平的世界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精力充沛地宣稱一個人的認同，常常像一把雙刃刀劍，使那些被譴責的緘默者最後發聲，而同時也顯示，我們透過否定他人來界定自己。以後現代思考的語言來說，我們已經可以見到，認同是如何在散漫的和文化的關係裡建構起來；一個人是什麼，總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界定—這「他人」且常常是被否定地負面對待的人。身為黑人的樣子，是身為白人者的觀察；身為阿拉伯人的樣子是與身為歐洲人者對其之否定，身為女性，是與男性相對等等。這些事例中的前者，變得更為具有被後者投射在所排除的團體的負面特質。這樣的思考，已經很有影響力地翻攪起那些種族主義者、厭惡女性的人、性別歧視者、或恐同者的歸類範疇，在這些範疇裡，他們將人類任意塗鴉為表面上似乎是定型的樣子。我們可能以流動的觀點看待自身為誰，並且這總是與他人有關，而這些人是那些我們可能偏向視之為與我們全然區隔開的人。以有害的區分為界線，他者的特質被嘲弄。顯而易見地，個人宣稱其認同的自由，變成各種充滿恨意的、不容忍的傳播工具，其並非可通達更少暴力和更為和平的路向。Zygmunt Bauman曾提及，國族的「想像的諸社群團體（imagined communities）」，給所有種類的不容忍、盲目的愛國主義，以及分離主義，供給了語言，形成了「新部落（neo-tribes）」，提供今人遠離焦慮和不確定性、誓言維護傳統和確保認同的可能。然而，這樣做的代價過高，常導致目光狹隘或集權主義。

為正義和尊嚴奮鬥，的確常伴隨著痛苦和對他人的責難，以及朝自身迴向的痛苦，在和平教育的過程中，這是必須要去面對的。這個難題沒有簡單的答案。開創空間，使聲音能夠被聽到，的確意味著有時候要傾聽憤怒、敵意的話語。也許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以持續努力的教育工作，為差異搭起橋樑，儘管是不合、有所分歧或不滿，也要在人們之間開創同情的聯繫。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教育哲學

家 Jane Roland Martin 提到，學校和教室不僅是教導有關成就的、精熟的，有關產品的 (productive) 價值，而應是強調連結的、關係的，以及關懷的，有關再製的 (reproductive) 價值。學校乃有關成功和進步的一對世界上任何地方而言皆然—故很難想像能開創一種同情的和關懷的社群，使真誠和開放的對話成為可能，並使人們可為了對抗在多元文化裡的差異和**不公義**所帶來的痛苦議題而努力。在同情的和關懷的社群環境裡，學生並非彼此陌生而沈悶地共存；真實的、教育的社群，會使真正的對話和互動成為可能。這樣的環境，能讓個人學習如何面對並處理憤怒、不信任和不容忍的議題。大型的、非個人的、競爭取向的學校可能不會開創這種對話的、教育的社群；學習社群需是更小型、更親密的。而課程則強調合作、共同的支持、以及對學生生活目的和意義的批判反思。我從工作中得知，真正的對話社群，需要安全的、信任的、能說的機會，這只會在小型的、面對面的情境發生。除非教育的空間允許個人不以刻板印象認識他人，而是認知人都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有各種各樣人所會有的恐懼、希望、夢想和慾望，否則我們無法對抗自身的恐懼和偏見。這樣更為親密的空間雖不能保障社會和諧的進展，但是更有可能認可他人也是以人的價值而存在的。

強調和平教育裡的相似性與差異處

在為了和平教育而持續努力的歷程中，確認和重視我們的差異，只是做到了一半。正義和民主，與公民的和全球的願景不可分離，這的確暗示著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多元且複雜差異性的社會。然而我相信為和平而教育，也意味著教導那些與我們有關的、跨文化界線的、我們所共享的人性。雖然有些人不注重人性中超驗的部分，但我們的生活很難缺乏這個部分；畢竟在我們確認了差異之後，這超驗的部分能訴說一種深刻的品質，連結並統合了人的存在。對某些人而言，人性是哲學的發明，然而對其他人而言，是難以表述的、造物者的創造。

難以否認地，珍貴而獨特的人類生活是多麼具有影響力及富有轉化力，能促發超常和具延展性的運動，授予各地人的人權，使人類生活具有莊嚴神聖與無法估量的一面，這樣的深度感覺獲得滋長，並且釋放了一種激進的視野，使我們相信只有在愛的社群裡，才可以真實且全然地尊敬每個人無限的價值和尊嚴。這樣深度的關注，不僅激勵了許多可能性，而且使我們能革命性地批判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如法國的猶太哲學家 Emanuel Levinas 建議我們，去看看每個人臉上浮現的造物者的面孔，而當這張面孔轉變成他者的時候，可讓我們掌握自身在倫理上已經變得麻木。把人當成他者，使世界變得去人性化，則人將剝削、侵犯、支配，或謀殺他人。這在我們非常麻木的世界裡，的確是許多人每天的現實生活。我相信為了和平的教育，意味著教導學生去肯認珍貴或莊嚴的生活品質，以及來自愛的社群所滋養和發展的不可分離性。這也意味著要教導我們的學生，有多少價值觀驅動我們的社會，使我們的世界漸漸地變了樣。剛毅的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的二者匯聚，助長競爭、控制、侵略、分離，和摧毀自然的態度，阻撓並毀壞了世界莊嚴神聖的一面。身為教師，我們必須追求學生道德或精神傳統中的這些層

面，它是人類生活中超常的價值，可在宗教、政治或文化信念當中找尋。我從自身經驗得知，有時許多學生可發現人類生活的觀點，這些學生的世界觀，與種族主義、我族中心主義、負面地區隔人類等的想法大相逕庭。為了和平的教學，意味著激發並確認我們世界觀中的這個部分，視生活為具有不可估量和超驗的價值。在我的教學經驗中，最有影響力就是見證超驗的發生，即當個人受到鼓勵去承認其他人也是人（待人如人）的時候，而神聖莊嚴的存在，其價值就是他們所存在的樣子。

一個愛與同情的教學實踐論

在談及以一個愛的社群來修補和療癒我們的世界時，我有時會被問到，愛可否透過教導而來。我承認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而當人類行為迫切地需要轉變得更為明智時，可決定我們應該教甚麼的依據，不能只是經驗上為實證的或是可預測得到的東西。人們之間有愛相連繫的願景，不只能激起我們的想像，促發許多可能性；也促使我們能對抗仇恨和暴力。同時也能迫使我們發現自己距離 Daniel Landes 和 Sheryl Robbin 所謂的「倫理的留心 (ethical mindfulness)」有多遠。所謂倫理的留心即考慮到他人痛苦的敏覺和想像，這在人類的相互接觸和關係當中是為必須。對許多我教過的人來說，可發現因少了倫理的留心，而產生的不和諧的失衡感，激起了對於改革轉變的渴望。為了和平的教學實踐，其本身並不製造和平，但的確鼓勵了 Herbert Marcuse 所謂的「內在批判 (immanent critique)」；即深度欣賞這種矛盾：世上有這麼多不必要的痛苦，但也有著憧憬關懷的、正義的人類社群的永恆夢想。如果我們只是短暫地與我們的學生相處，教室可能會變成一個我們稱之為充斥著無法容忍的分裂的地方。

貳、評論/ 議題討論

一、本文的內容有其深刻之處，在援引 Hannah Ardent、Paulo Freire、Zygmunt Bauman、Jane Roland Martin、Emanuel Levinas、Daniel Landes 和 Sheryl Robbin、以及 Herbert Marcuse 的脈絡下，大致可見其理路。

二、本文指出和平教育教學實踐的重要原則，除具理想性之外，也提到和平教育的困難和阻力，比如邪惡之常態化的現象、軍事動員對青少年的影響、經過「消毒」的學校教科書，此外，肯認人類經驗之多樣化，需具備對抗自身利益的勇氣，而重新定位自己，需面臨不斷的自我批判與檢視，加之資本主義和實證觀點腐蝕高遠的理想，甚且，夢想在愛的社群中追求超驗之共性，體現正義與關懷，似乎是永無止境的漫漫長路。和平教育任重道遠，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